

高校质量文化及其建设路径探索

林双泉

(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福建福州350117)

[摘要] 高校质量文化的形成是师生长期实践活动的结果或效应,是多种要素整体作用的结果,是一种集合性的精神活动,是一种集体人格,它形成的基础在于认同,具有独特性。高校质量文化建设成效不明显,原因在于其建设存在功利性,忽视其建设的长期性、共识性、递进性、连续性及对其建设成效的评估。有效推进高校质量文化建设需要高校最高决策者的重视,塑造追求卓越的共同发展愿景,科学构建建设体系,构建学校发展命运共同体,注重培养集体人格,建立建设成效定期评估机制。

[关键词] 高等教育;教育质量;质量文化;质量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 G 6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493(2023)06-0058-07

质量文化建设是21世纪全球发达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与建设新方向。2019年9月29日,教育部印发了《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明确地把质量文化培育作为新时代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核心,提出了要“全面推进质量文化建设”的要求。质量发展最底层的土壤是文化。从质量保障与发展的成效看,短期看项目,中期看管理,长期看文化,这已是一种实践与认识上的共识。我国大学目前都十分重视质量文化建设,然而多年过去,许多大学在质量文化方面的建设成效却并不明显,出现诸多误区,根本原因在于对高校质量文化的内涵、特点及形成的条件缺乏深入、系统的思考。

一、高校质量文化形成的特点

高校质量文化是指经过多年的积淀与发展,高校内部相关人员在教育教学实践活动中,通过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优化质量管理程序等过程,所普遍形成的以人才培养质量问题为核心的相同的价值理念、一贯态度及行为习惯。质量文化,从词义结构上来分析,包含质量和文化两个词,但这两个词并非是并列的关系,而是偏正关系,即质量是对文化的限定与修饰,核心词是文化,因此,质量文

化是文化在质量领域的具体体现,或者说是质量领域所体现出的文化特质。质量文化研究的并不是质量与文化的关系,而是质量实践基础上所形成的文化问题。高校质量文化既属于质量的范畴,也属于文化的范畴。作为高校内涵式发展的一种价值建设和文化样态,一所大学质量文化的形成具有以下特点。

(一) 质量文化的形成是一种师生长期实践活动的结果或效应

首先,质量文化是基于质量实践基础的升华、创造。英国文化人类学家马林洛夫斯基认为,文化是“一个满足人的要求的过程”^[1],即文化之所以被创造出来,是基于某种价值或有用性的原则。高校通过实践不断修正优化物质保障、技术、制度等以满足人们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要求,并通过实践检验对有效的质量保障要素和程序予以固化,经过长期累积逐渐形成一所高校的质量文化。钱穆认为,文化并不是一时性的,而是具有长时间的绵延性^[2]。一所高校基于对教育质量的不断追求与实践,随着绵延不断的演进,便形成了所谓的质量文化。一所高校的质量文化必有它的传统。其次,从空间上说,一所高校所形成质量文化具有发展性。有生命力的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实践基

[收稿日期] 2023-08-03

[基金项目] 福建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2年度课题“大学内涵式发展背景下高校质量文化的研究与实践”(FJJKBK22-093)

[作者简介] 林双泉(1971—),男,福建龙海人,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成人教育学、高等教育学。

础上的不断发展和演进，是永远正在形成的“将成之物”，因为只有有生命力的质量文化才具有绵延性，才不会最终走向消亡。这就决定了质量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需在保留根基的情况下开放包容与时俱进，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及教育理念和价值观的变化不断发展。可以说，一所高校的历史就是一部探索质量生存、质量立校及质量文化形成的实践史，就是人们将质量文化付诸实践的过程。

（二）质量文化的形成是多种要素整体作用的结果

文化是由多种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一要素构不成文化。文化的构成要素主要有物质产品、技术、语言和符号、信仰、价值观及认知体系、规范体系、关系体系等。文化各要素的地位及构成方式即是文化形式结构。1990年，美国学者沙因（Edgar H. Schein）提出组织文化四层次理论，将组织文化分为表层的物质文化、浅层的行为文化、中层的制度文化和深层的精神文化，其中，精神文化是组织文化的核心^[3]。上述4个层面的结构具有递进性。物质文化是质量文化的基础性层面。一般来说，物质层面较薄弱，其质量文化的强度也相对较弱。与其它层面相比，物质层面对质量文化强度的影响力相对较小。行为文化建立物质层面之上，物质基础相同，行为模式不同，质量文化的层次也就不同。制度文化是塑造行为文化的主要机制，它是一所高校教育思想、教育理念的反映或载体，主要涉及标准化与规范体系、奖惩制度等方面。其中，标准化与规范体系对主体的行为及行为结果具有指导与评价的作用，它是质量实践活动目标的体现。奖惩制度对个体行为模式具有导向、激励与约束、矫正作用，执行的公正性、及时性和制度的健全性决定了奖惩制度是否有效。精神文化是质量文化建设的终极目标，表现为组织机构内群体积极主动地追求质量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

（三）质量文化是一种集合性的精神活动

文化的主体是人，是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许多人共同的精神活动。这些人既可以是一个组织、地区、社会、民族、国家中的整个群体，也可以是一定时期中一群人或特定群体。质量文化是许多个体对质量共同追求的精神活动的集合，任何个人无法构成文化。从覆盖面来说，一所高校既存在着全校性的质量文化，也存在着局部性的质量文化——圈子文化，但不同的圈子文化可能会存在冲

突。一个高校存在过多的圈子文化，会影响并损害教育质量持续改进的合力与目标的达成。但无论是整个群体，还是部分人群或特定人群，从实践、创造和认同、接受的角度来看，文化的主体最终只能是个体。

（四）质量文化形成的基础在于多数的认同

文化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过程中产生，在共同认知、共同行动、相互评价、相互认可中产生，是在协同基础上的一种共识，具有很强的社会性。从认知的图式来说，认同的过程包括个体的认知、判断、选择、整合、内化及外化。认同以个体的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为必要前提，即个体根据理性认识，出于意志的自由选择，自愿地选择和自觉地遵守并践行制度规范。值得注意的是，一种文化的形成或认同起初并非都是主动的、自发的，持久的强制推行与灌输最后也会让人形成一种自觉的认同，从而形成一种文化。认同源自于需要：一是更好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层面的需要，二是个体精神的满足。如合乎文化规范，可以在群体中获得良好的社会关系、归属感、尊重及自我实现等。高校质量文化的认同具有全体性的特征。全体性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质量文化的要素及运作要获得全校所有机构的认同与支持，而非仅仅是质量管理机构；二是获得绝大多数师生的认同——不是自觉认同，就是走在认同的路上。高校从最顶层到最基层对学校的质量观、价值观及管理、运行等要有一致理解，面对教育质量问题会形成一致行为反应。学校高层认同的质量观若得不到基础的认同，就不能算作质量文化。

（五）质量文化的形成具有独特性

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社会发展环境下，不同类型的高校其自身的情况、所面临的社会情境、目标定位及人员所具备的知识素养等均不同，这些差异性会造就不同的质量文化。因此，每所高校的质量文化均具有其独特性，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质量文化存在于两所高校中。这从侧面说明了文化移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技术移植较容易，但技术背后隐藏的深刻文化因素，特别是制度、道德和观念因素，很难移植。这也说明有些质量文化之所以只能出现于某些地区、某些类型甚至是某一高校中，是因为环境或条件限制了这一文化的创造、使用及传播；相反，有些质量文化的创造若能满足不同地区、不同类型高校的需

要，那么这些质量文化便可实现跨区域或跨高校的使用、交流与传播。

(六) 质量文化是一种集体人格

集体人格是一个群体普遍的人格类型，是“绝大多数人在思想、情操及行为上所表现出来的某种大概固定形态”，这种形态表现为“多数成员共有的反复出现的心理特质和性格特点的总和，是人格的综合体”^[4]。文化体现了群体的基本价值观及行为模式，是一种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相同的生态共同体，因此，文化实际上是一种集体人格。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 Gustav Jung）说：“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5]。荣格这里所说的“浮士德”已不是一个人名，而是德意志民族的集体人格——德意志文化的象征。当质量文化沉淀为一所高校的集体人格，它便成为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本能的活动，从而自觉地规范了该大学人员的行为、思想和情操。一旦质量文化沉淀为一种集体人格，就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持久性，很难改变。

二、高校质量文化建设的误区

(一) 质量文化建设存在功利性

质量文化建设的功利性主要体现在建设的主要目的上：一是为了顺利通过评估，二是为了向政府争取更多的资源。这种情况下，质量建设外化为政府的工程、计划和项目，质量则倒退为手段。当前，许多高校现行质量保障仍存在由外而内、由上而下进行推动的情况，即质量认可、评估与问责由政府组织、实施，标准由政府统一制定，政府充当了领导者和建设者的角色，高校被动地成为质量标准的执行者和质量保障过程的实施者。质量建设忽视自身办学历史以及学科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没有与自身的办学目标与定位以及具体的社会、学校情境相结合，缺乏个性与自身特色。高校无法真正成为质量保障的主体，这种质量保障与评估最终将沦为政府外部质量评估或问责的翻版和预备。质量文化建设就很难逃脱行政主义、管理主义的模式。“有证据显示，外部质量保障虽然制定了大量的程序与规则，但并未能提高教职工和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未能提高教育质量，质量经常停留于话语层而未能转化为高等教育成员的行动”^[6]。根本原因在于，外部性的要求无法使质量保障和质量管理内化为广大师生内在需要、内在心理意识结构，并转化

为广大师生内在的道德自律^[7]。

(二) 忽视质量文化建设的长期性

一是试图通过学习借鉴一蹴而就。应该看到，我国高校质量保障制度并不是高等教育发展的自然结果，从整体上来说是舶来品。相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已有百余年历史的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与保障活动，中国于1985年才开始实施高等教育评估。本世纪初，随着高等教育步入大众化时代，国内兴起了大规模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与保障活动，众多高校开始大面积学习借鉴国内外高校先进的质量保障经验与模式，引进企业的“全面质量管理”和“IS09000质量体系标准”。然而，模式可以借鉴，制度可以模仿，但文化不能直接复制或移植，它需要时间的积淀和养成。另外，企业与高校是两个不同的体系，高校简单套用工商界的质量管理方面会存在“水土不服”“食洋不化”的现象。高校间的历史、定位、特点等不同，也无法简单、直接套用。二是缺乏对质量文化建设的长期规划。许多高校对质量文化的内涵、特征、价值与形成规律的理解停留在表面，缺乏深入的探讨，缺乏对质量文化建设的整体规划和系统设计。例如，依照自身的实际与历史，高校应确立何种质量观？要采取怎样的质量标准、发展路径和模式？高校质量文化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它的演变和发展规律是什么？高校质量文化的构建有哪些基本步骤和主要策略，要遵循哪些原则？在高校重组与合并过程中，如何对具有不同传统与特色的质量文化进行传承、整合、扬弃和创新？以及如何借鉴、吸收外校及其他行业、领域优秀的质量文化成果等。

(三) 忽视质量文化建设的共识性

一是质量文化建设的主体仅局限于学校的领导层及相关管理部门。许多高校质量文化建设采取一种“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模式，即由学校领导、质量管理部门扮演决策者、管理者的角色，负责质量文化建设的规划、实施、评估与改进，其他部门协同参与少，广大师生被动地充当着执行者、服从者的角色。质量文化建设被认为是质量管理部门的事情，与其他部门、广大师生关系不大，甚至无关。二是从最顶层到最基层未形成对质量的一致理解。学校缺乏明晰、有特色的办学理念，甚至教育理念落后或出现偏差。无法获得广大师生的认同也就无法唤醒他们的质量意识和质量责任。现我国的高等教育已从大众化向普及化阶段过渡，但一些高

校的教育观念、教育结构、教育标准、课程内容、教学模式等仍未跳出精英化办学的窠臼。质量保障制度、质量标准等制度性、“刚性”约束未能反映高等教育规律和高校质量的本质，造成了高校质量保障的错位，甚至出现发力越猛，效果越差的“南辕北辙”的现象。另外，学校对于现行或拟推行的教育理念、质量标准及质量管理运行机制等未能进行广泛的宣传与平等的讨论、交流，广大师生未拥有较广泛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而广大师生群体恰恰是高校质量文化形成的基础，缺乏对高等教育质量一致性的理解与面对质量问题的一致性行为反应，高校就不能形成全员参与、全员推进、全员落实的质量建设氛围。

（四）忽视质量文化建设的递进性与连续性

一是忽视质量文化建设的递进性。质量文化不是虚无飘渺的，它的形成建立在物质保障、质量保障程序、质量保障技术等基础之上。当前，我国高校教育质量管理与保障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许多高校仍未建立起与国情相适应、具有本校特色的教育质量管理思想与模式，质量保障体系还不完整、科学，运行也并不高效。忽视对健全的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忽视对管理与控制技术的建设和完善，超越技术而直接走向文化，超越控制而仅强调道德自觉与自律，质量文化建设就很容易流于形式，流于口号式的建设，成为空中楼阁。二是忽视质量文化建设的连续性。一些学校，每换一任校长，办学理念、办学定位、办学愿景就换一次。办学理念、办学定位随意改变，会让学校师生浮躁难安，而缺乏宁静致远的办教育心态，很容易让学校师生迷失自我。另外，学校质量保障的机构、人员、制度、程序及运行机制变换也比较频繁。缺乏连续性，改革就无法深入、持久。缺乏历史的延续性，很难积淀出学校质量文化。

（五）缺乏对质量文化建设项目的评估

研究方面，国内高校绝大多数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理论阐释上，虽有少量的对发达国家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质量文化工程”的效果检验的介绍，但基本上未有对国内高校校本质量文化成熟度、质量文化建设成效评估的研究成果。实践方面，国内有些高校虽然制订、公布了质量文化建设项目并予以推行实施，但鲜有对质量文化建设成熟度、质量文化建设成效或质量文化指数（Quality Culture Index，简称 QCI）的评估。由于缺乏实证

研究，缺乏定量评价与分析，没有构建一套完整科学的质量文化建设评估框架，各高校对本校的质量文化建设状态也仅停留在感性、模糊的认识阶段，难以准确揭示本校质量文化的演变过程和发展的模式特征，准确把握相关利益者特别是师生对“期望的”和“实际的”质量文化的看法，也就无法发现质量文化与高校内部质量保障活动相互影响的症结之处，从而难以提出有效的干预、修正措施以缩小差距，达到持续改进的目的。

三、有效推进高校质量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一）学校的最高决策者重视

大学最高决策者对质量文化建设起到了引领、保障的作用，没有最高决策者的认识、决心和力量，就没有大学的质量文化。学校最高决策者要确信质量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并把这种重要性传递给学校其他成员。要强化文化领导力，亲自策划和领导大学质量文化建设，真正地把高校内涵发展内化于心，外化于形。要摒弃质量建设的短期化和功利化倾向，不搞运动式建设，试图“毕其功于一役”，而应有步骤、有选择。要确保学校不仅要有定位，更要有“定力”，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要在“据旧”中不断“开新”。另外，领导要以身作则，发挥示范效应和权威效应，在信念、价值观、准则等方面时时处处体现“质量第一”“追求卓越”的教育质量观。

（二）塑造追求卓越的共同发展愿景

追求卓越是大学精神的一个重要体现。剑桥大学校长艾利森·理查德教授指出，“当今的杰出大学都明确地渴求卓越”^[8]。质量文化就是指这种追求卓越的精神和价值观。共同愿景是指学校全体成员发自内心的共同的愿望或意愿。高校在塑造共同发展愿景时，必须以追求质量卓越为目标和使命。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大师彼得·圣吉博士（Peter M. Senge）在其著作《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中说：“共同愿景是一个方向舵，能够在遭遇混乱或阻力时，继续循正确的路径前进”。“当一群人执著于一种心中的愿景时，便会产生一种力量，做出许多原本做不到的事情”^[9]。好的大学之所以能够取得卓越的成绩，就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愿景。共同愿景能够淡化校内成员间的个人利益冲突，将学校与个人、价值与追

求、责任与使命融为一体，由此形成巨大的感召力，激发出强大的驱动力，使全体成员焕发出无限的创造力，形成长期的凝聚力。在没有共同发展愿景的高校中，广大师生通常对规定被动地遵从，组织活动无法聚焦核心目标，质量文化建设就将成为空谈。值得注意的是，建立共同愿景不能通过规定或命令等强迫性的方式或举措，只能靠不断地沟通和分享。

（三）构建学校发展命运共同体

构建学校发展命运共同体就是要让全校上下相信良好的质量保障与学校发展、与自身发展休戚与共。首先，良好的质量保障应体现师生发展的共需、共赢。教师充分调动学生全身心参与教育教学活动，学生的人格获得尊重，不断激发出学习的主动性、创造性，同时，教师收获了教育教学的成就感、为人师表的荣誉感，生命的价值得到实现。师生双方在互动共享中实现了共同成长，并最终实现师生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诉求。其次，要构建学术（含教学学术）与行政的良性互动关系，“学术”与“行政”关系融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学校的行政（辅助）人员与教师学生均认为学校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把“服务”内化于心，这不仅来自行政人员对学术人员的服务，也来自学术人员对行政人员的服务，是一种相互服务的文化^[10]。再次，构建学校发展命运共同体离不开各方在平等基础上的多渠道、多形式互动交往。充分、平等的交流与对话使得各方的声音与意愿得到表达与考虑，为寻求一个各方都可接受的方案和结果提供了基础，从而保障了后续工作顺畅运行。要重视民主决策和参与管理，建立健全学校的表达机制，重视教师和学生的需要，尊重他们的主体地位，吸引他们参与到学校质量管理、质量决策和质量建设的过程中来，充分发挥他们的潜能和创造力，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积极推动教育质量持续改进的质量文化氛围。

（四）科学构建大学质量文化建设体系

质量文化建设体系包括包含三个核心要素：价值理念及目标、制度、机制。质量理念是办学者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价值决定理念。理念是质量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它决定了质量文化的范畴和内涵。同时，理念决定制度，什么样的价值和理念在大学占上风，就会有什么样的大学制度和学术，就会有什么样的高校质量文化。首先，要对本校质

量文化的特点和状况进行梳理，衡量其强度、深度、广度和有序性，通过 SWOT 分析，分析学校质量文化的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es）、机会（opportunities）与挑战（threats），以确定大学质量文化建设的中长期目标。确立科学的大学质量文化价值理念，一是要以人为本，即高校要围绕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来构建质量文化，要创设学习型校园，营造浓厚的校园学习氛围。要建立教学与科研、社会服务的相互融合与内洽机制，既能建立一流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的教师队伍，又能让广大教师在岗位上有幸福感、事业上有成就感、社会上有荣誉感。二是要明晰学校办学定位和办学目标，要求科学合理、内涵清晰，得到广泛共识。在高等教育开始普及化的时代，每所高校都要相应地去寻找自己的位置，确定自己的层次、类型、使命以及定位特色，突出个性。层次、类型、使命不同，组织模式和管理模式就不同，质量文化的特点也就不同。实际上，高校质量文化概念的提出，就是基于高校办学的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基础。其次，要按照学校质量文化建设的价值理念健全保障制度。制度就是将质量文化建设用条文的方式确定下来，成为执行机构和监督系统工作时的依据。诸多环节要以条文的方式做出具体规定和严格要求，明确各环节的质量标准，建立健全教育教学基本规范和基本流程，使得质量文化建设工作的每一个环节都做到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再次，要构建完善的质量文化建设机制。机制是指在质量文化建设过程中，影响质量文化形成的各组成因素的结构、功能及其相互联系，以及这些因素产生影响、发挥功能的作用过程、作用原理及其运行方式。质量文化建设需要有多个互为基础的机制来保证，这些互为基础的机制最终逐渐演变成一个体系，就是质量文化建设体系。质量文化建设机制要确保使整个体系得以运行并有效运作，最终培育出以质量及提高质量为核心的教育价值观、教育发展观，通过自省、自律、自查、自纠达到质量持续提高的目的。

（五）注重培养集体人格

集体人格本质上是一种组织人格，“其塑造、更新与升华就必须保持组织的强势主导，保证组织意志指向明确，连续一贯的灌输、渗透和引导”^[11]。一要不断地以各式各样的载体教化、忠告、鼓励人们自身行为规范符合学校质量文化内在

的道德规范、生活方式、价值取向。二要反复地进行沟通、分享与宣传，让全校师生员工理解、认同质量保障的愿景、理念及质量保障的制度、方法、流程，同时要让全校师生员工全面了解当前学校质量保障的成效与存在问题，树立起质量保障的主人翁意识，自觉地形成对教育质量的忧患意识和不断提升教育质量的服务意识，自觉地全方位、全过程地将共同愿景贯彻落实在学校各项工作中去。三要以持久的制度式驱动和奖励处罚促进师生员工的“认可”及“内化”，达到意识和行为的自动反应。四要掌控舆情，及时收集各种办学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和建议，秉持质量文化建设的创新开放发展理念，不断地予以修正和调整，以有效的沟通使大学内部成员不断巩固强化共同的质量道德观及质量价值观。五要充分发挥榜样的示范作用，引发蝴蝶效应。

(六) 建立质量文化建设成效定期评估机制

质量文化建设开展一段时间、进行到一定的程度后，要建立一套系统对建设效果或质量文化成熟度进行评估，并形成评估报告，公布质量文化建设级别（从低到高的成熟度分别为检验级、保证级、预防级和完美级）、层级（从低到高的层级分别为质量的物质层级、行为层级、制度层级和精神层级）或质量文化指数。评估应包括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两部分，客观指标包括物质、行为及制度，主观指标主要以问卷调查、访谈、专题研讨等为手段，并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均值结构模型等实证方法进行分析。问卷调查和访谈主要了解个体对本校质量保证框架的认识、学校质量保证标准与准则的执行情况、个体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情况、信息的利用情况、对质量保证影响因素的看法、内部质量保障的运行效果评价及其对质量文化的影响程度等。调查和访谈对象应包括各方及各层次的人员。专题研讨主要探讨质量文化发展和质量保障过程之间的动态关系及质量文化发展中一些好的做法与挑战。通过评估，以数据和事实说话，准确地了解质量文化建设中物质、制度建设及各类人群的思想和行为状态、实际质量文化水平与各方的期望之间的差距，以固化成功的经验，并分析总结失败的教训，针对其中的问题提出缩小差距的有效措施，最终达到质量文化建设理念的科学化、制度的科学化、技术的科学化的统一及持续改进的效果。同时，在评估中要注意收集并呈现成功的典型案例，以便广泛宣传推广。

投稿网址：<http://xuebaobangong.jmu.edu.cn/jkb/>

[参考文献]

- [1] 庄锡昌, 顾晓鸣, 顾云深. 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 [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371.
- [2] 钱穆. 中国文化史导论: 修订本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7.
- [3] 陆雄文. 管理学大辞典 [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3: 55.
- [4] 沙香蓬. 中国国民性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 4.
- [5] 淡墨书香日子长. 余秋雨: 文化最终的成果, 是集体人格 [EB/OL]. (2019-08-15) [2023-05-06].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9/0815/15/51201662_855109019.shtml.
- [6] 杜云英. 高等教育质量管理新进展: 质量文化研究 [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2, 14(3): 17-20.
- [7] 刘振天. 为何要提“高等教育质量文化” [N]. 光明日报, 2016-06-07 (13).
- [8] 曾澜. 差异与优势: 对杰出大学的反思——艾利森·理查德教授在复旦大学的讲演 [EB/OL]. (2006-05-28) [2023-11-10]. <https://wenku.so.com/d/614884d57cela46c3a2822fa9081841d>.
- [9] 圣吉. 第五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 [M]. 郭进隆,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4: 238.
- [10] 闫震普. 师生命运共同体的内涵、意义及构建策略 [J]. 教学与管理, 2019 (3): 13-16.
- [11] 王克平. 略论文化建设中的集体人格 [J].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36 (6): 176-177.
- [12] 王保华. 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反思与超越 [J]. 山东高等教育, 2015, 3 (8): 5-12.
- [13] 罗儒国, 王珊珊. 高校质量文化建设的误区与出路 [J]. 现代教育管理, 2013 (10): 30-36.
- [14] 范怡红, 黄洁. 西班牙第斯托大学的内部教学质量管理——基于博洛尼亚进程中的“欧洲教育结构调整计划” [J]. 复旦教育论坛, 2011, 9 (4): 75-79.
- [15] 刘欢. 余秋雨定义文化: 精神价值、生活方式和集体人格 [EB/OL]. (2013-04-22) [2023-05-10]. <https://www.chinanews.com/cul/2013/04-22/4753594.shtml>.
- [16] 韩延明. 新时代大学质量文化探要 [J]. 中国高教研究, 2022 (9): 32-37.
- [17] 邬大光. 高等教育: 质量、质量保障与质量文化 [J]. 中国高教研究, 2022 (9): 18-24.

(责任编辑: 容媛媛)

Exploration of Quality Culture in Universities and its Construction Path

LIN Shuang-quan

(College of Educatio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17, China)

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a quality in universities is the outcome impact of a long-term activity conducted by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which is the overall result of multiple elements. It is a collective spiritual activity and a collective personality. The foundation of such a culture lies in the act of identification, possessing a unique character. The limited success of cultivating a quality culture in universities can be attributed to its utilitarian tendency, ignoring the long-term consensus, progressive and continuous nature of quality culture construction.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 quality culture in universities,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highest decision makers to attach importance, shape a shared vision for pursuing excellence, scientifically establish a quality culture construction system, build a school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cus on nurturing a collective personality, and establish a regular evaluation mechanism to assess the effectiveness of quality culture construction.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educational quality; quality culture; construction of quality culture



我校承办首届“诚毅之光”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 一体化建设学术研讨会

11月10日至12日，以“赓续嘉庚精神培育时代新人”为主题的首届‘诚毅之光’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市杏南中学（后溪校区）举行。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省教育学会会长、一级巡视员陈明庆，集美区委副书记苏国辉，校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潘登分别致辞，共同表达了对陈嘉庚先生的崇高敬意，并对未来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的发展提出了期望。厦门大学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机像，省教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省教科所所长吴明洪及来自全国各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育科研院所和中小学校的专家学者、思政工作者参会。

研讨会上，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厦门大学、太原理工大学、集美大学等高校以及《新课程评论》编辑部的专家们分别作主旨演讲，从不同角度呈现了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分享了北京、上海、江西、贵州等地的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经验。集美中学、杏南中学、集美小学、集美大学代表介绍了各自的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实践经验。集美区教育局展示了集美弘扬嘉庚精神、推动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的丰硕成果，分享了各校在课业教学、社会实践、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创新尝试，为全国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提供了“集美经验”。

本次研讨会由福建省教育学会、集美区人民政府主办，集美区委宣传部、集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集美大学陈嘉庚研究院、集美区教育局、集美区后溪镇人民政府承办。

（文/图：马克思主义学院/编辑：宣传部）